小 月 氏 考[1]

荣 新 江

月氏，先秦文献又称作禺氏、禺知，是秦汉以前中国西北部的主体民族之一。《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称："大月氏……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两汉以来，小月氏仍然活跃在西北广大地区，我们在汉魏时期的史料中不时可以找到有关这个民族的记载，但西晋以后，这个曾经称雄一时的月氏民族似乎已经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只有一些有关他们的遗种后裔的零星记载，尚可在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五代的文献中找到，向人们透露了一些他们活动的信息。对于这些史料的分析，不仅使我们对月氏这样一个大族在中国的消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探讨晋唐间民族关系的一般规律。

一

由于史料的分散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使得两汉以来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相当活跃的角色的小月氏往往被史学家们所忽略，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学者虽然不多，却在其分布和后裔的去向问题上纷纭其说，各执一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一）周一良、唐长孺、姚薇元诸先生在论述北凉建立者沮渠蒙逊所出自的卢水胡时，都把卢水胡视为小月氏。其理由，一是两者分布的地域都在西平、张掖之间，特别是湟中一带；二是沮渠蒙逊自称其祖曾于汉代"翼奖窦融，保宁河右"（《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而《后汉书》卷五三《窦融传》恰好载有"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与大军会高平第一"，征讨隗嚣。因此说卢水胡即小月氏。[2]

（二）姚薇元先生还认为："羯族乃匈奴治下之月氏族。"其主要理由有五条：(1)石勒出于戎裔。(2)羯胡状貌多高鼻多须，与月氏同。(3)《隋书·西域传》载昭武九姓本月氏人，羯族之石勒与月氏之石国当出一源。(4)石勒之烧葬本俗与石国同。(5)石勒所居"羯室"殆即

石国别号"赭时"之同音异译，为胡语"石"之意。因此，羯族即月氏。(3)

（三） 霍古达(G. Haloun)等人持吐火罗种说。这种观点认为，月氏西迁时经过焉耆、龟兹，有一部分遗众留在那里，因此可以认为焉耆、龟兹是月氏的后裔。这种看法的提出，是由于本世纪初所谓"吐火罗语"的文献在库车、焉耆和吐鲁番发现所引起的，并且和古代欧亚内陆两大民族月氏和吐火罗是否等同的问题密切相关。在此不可能全面回顾关于所谓"吐火罗语"定名争论的所有观点，只扼要地检出与本论题有关的一些看法。早在1937年，霍古达就在《论月氏》一文中，把月氏比定为吐火罗，并认为月氏西迁时，曾有余众留在焉耆。(4)翌年，恒宁发表《焉耆和"吐火罗人"》，认为月氏的遗众留在乌孙人中，至唐初而为乌孙同化，而乌孙和月氏人又都融汇于龟兹、焉耆人中，只是将他们的名称ārši/ärsin(乌孙)和tuγr(即月氏)留给了焉耆。(5)冯承钧先生在《中亚新发现的五种语言与支白安康尉迟五姓之关系》一文中，假设焉耆语即月氏语，月氏、乌耆本同一对音，且敦煌所出宋人写本《西天路竟》将高昌、龟兹间的国名，唤作月氏，因此可以认为焉耆即月氏。(6)黄文弼先生从月氏西迁必经焉耆、龟兹，而焉耆、龟兹皆与月氏音近两点出发，推测二者或许就是大月氏西迁时所建之国家。(7)蒲立本的《汉人与印欧种人》则以为，月氏、焉耆、龟兹原本都是讲所谓"吐火罗语"的同一民族。(8)恒宁在其遗作《历史上的第一支印欧种人》中，推测月氏和吐火罗分别来自西波斯两个相邻的部族Guti和Tukriš，龟兹和焉耆(即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题记中的Tuγri)正好分别相当于Guti和Tukriš。(9)黄盛璋在接受月氏西迁途中有遗种留在焉耆、龟兹这种看法的前提下，又进一步认为出身焉耆的龙家"和仲云一样应即小月氏的遗种"，"焉耆龟兹王族和其国民是同一种族，所以焉耆龟兹都可称为月氏。"(10)贝利教授在他关于西域古代各民族的总结性论著《印度斯基泰研究·于阗语文书集》第七集中，试图从语言学上证明，在所谓"吐火罗语"使用之前，焉耆龟兹就存在着一支讲伊朗语的*tu-γara族，也即月氏族。(11)

（四） 蒲立本在中国西北很早就生存着一批讲所谓"吐火罗语"的民族的假说基础上，特别从语言对证出发，将月氏比定为尉迟、越质。他认为，尉迟最早并不是指于阗王姓，而初见于《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公元265年，国仁先祖之一利那"立击鲜卑吐赖于乌树山，讨尉迟渴权于大非川，收众三万余落。"大非川恰好和小月氏住地湟中相近。另外，他还根据《魏书》卷二《武帝纪》："（天兴）六年(403)春正月辛未，朔方尉迟部别帅率万余家内属，入居云中"的记载，认为从此以后，尉迟部也即月氏的后裔成为北魏八姓之一，直到唐代，仍处于显贵的地位。(12)

（五） 榎一雄认为，蒲立本关于尉迟等于月氏的语音对证并非不妥，但大非川一带自三国时代就有鲜卑移住，因此不同意把尉迟部视为月氏，而据《周书》卷二一、《北齐书》卷六二《尉迟迥传》，看作"魏之别种"，即和北魏相同的鲜卑，但和拓跋氏不同的部落。至于小月氏的

去向，榎氏搜罗了相当丰富的汉魏晋南北朝的史料记载，认为他们在汉魏时仍然活跃在河西陇右一带，到了十六国时期，则可以从《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所列举的石勒助手支雄、支屈六等月氏胡人的活动中，找到他们的动向，从而得出结论说，公元四世纪初，月氏遗裔活跃在渭水盆地东部至山西省西部地区。此外，从《高僧传》卷一竺昙摩罗刹（法护）条以及唐五代敦煌文书所记支姓人等材料看，月氏的故乡敦煌，也应有一个月氏集团的存在。(13)

上面是从我们所见的研究文献中捡出的有关小月氏去向的种种成说。这些说法大多数是学者们在讨论其他问题时附带提出的，蒲立本和榎一雄虽然用了相当的篇幅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但却对北朝隋唐五代的材料注意不够，于前人提出的相反论点，也没有提出充分的驳难。随着研究的进步和文书、碑志等材料的出版，目前可以对前人的观点做一个综合的分析，并利用前人研究的成果和我们自己考查的收获，提出我们的看法。

二

从上面的种种论说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汉魏以来活跃在西北地区的许多民族，诸如卢水胡、羯胡、尉迟部以及焉耆、龟兹的居民，或则由于名称读音的相似，或则由于所居地区的相合，都容易被人们视为月氏，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逸周书》卷七《王会解》记四方贡物，有"禺氏騊駼"。何秋涛《王会篇笺释》卷下考订："禺、月一声之转，禺氏盖月氏也。"騊駼是一种马。《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条《正义》引万震《南州志》言："人民赤白色，便习弓马。"又康泰《外国传》称："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正好可以作为月氏入贡騊駼的脚注，表明他们自古就是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其活动地区，《王会解》附伊尹献令著月氏于正北。《穆天子传》卷一："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王国维考订"禺知亦即禺氏，其地在雁门之西北，黄河之东，与献令合。"(14)以上仅存的几条先秦文献记载表明，当时的人们只知道月氏位于中国的北部。(15)至汉武帝时通西域，始知月氏的根据地在敦煌、祁连之间。在匈奴兴起之前，月氏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游牧民族，他们便习弓马，兼并诸戎，(16)就连匈奴的冒顿都曾为质于月氏，可以说他们是当时西北各族的主人。由此我们可以想像，由于月氏的声威和对西北各族的统治，许多民族都这样或那样地打上了月氏的烙印，并且和月氏纠缠不清了。

在具体地分析前人的各种解说之前，有必要说明以下四条原则。第一，我们在考察历史上两个名称是否指同一民族时，不能仅仅以两者名称读音的相似为依据，更重要的是找出他们之间在语言、地域、体质和文化上的共同点。尽管由于材料的缺乏，不可能做面面俱到的考查，但以往研究中所忽略的文化要素特别值得注意。第二，民族的发展，有着分化和融合两种

趋向，昭武九姓可以说是一个大族分化的结果，而魏晋时期的许多杂种胡，则是不同族别的混合体。这种由两种以上民族融合而成的混合体，其中尽管保留了某个民族的特征，但已不能将混合体本身视为这个民族了。至于一个民族的民众被其他民族同化了以后，除了他们的姓氏和体质特征还表明他们的来源外，他们在文化上已等同于同化他们的民族，而应被视为这个民族的成员了。第三，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查月氏消亡这个民族问题，就必须把考查的对象严格地放在大月氏西迁后到小月氏最终消亡（约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十世纪）的年代界限当中，根据史料记载，来判断各个部族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实际情况，而不应把论点建立在远古时代的假说之上。第四，考查语言的一致与否，是判断民族所属的重要手段，虽然许多民族的语言今已不存，但近代以来对出土文书和古代文献中外来词的研究，已经使我们对一些民族的语言所属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也是我们应予注意的一个方面。有了这样四条原则，我们就可以不去深究有些建立在看来合理的假设基础上的观点，而集中讨论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一些说法。

对于卢水胡即小月氏后裔的说法，榎一雄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只是觉得从前汉到十六国时期，小月氏的子孙演变是非常大的，卢水胡或许是小月氏的分支。(17)王宗维同志根据新出居延汉简中有关卢水胡的最早记载，结合史籍，力图说明西汉初年卢水胡居于姑臧境内的谷水，后向西迁徙到显美地方，归张掖属国都尉管辖。同时代的小月氏，主要居住在酒泉、敦煌地区，不在张掖郡。两者迁到湟中是东汉时的事情。因此认为卢水胡源于小月氏说不能成立。(18)根据本节开头所引史料，汉初月氏的大本营虽然是在敦煌、祁连之间，但这个游牧民族的实际活动区域决不止此。所以，仅仅从两者所居之地的不同还很难说服读者。其实，不论是在居延汉简中，还是在《后汉书·邓训传》里，小月氏和卢水胡都是并列出现的，(19)更明确的例证见前秦建元三年(367)《邓太尉祠碑》："甘露四年(362)十二月二十五日到官，以北接玄朔，给兵三百人，军府吏属一百五十人，统和、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支胡、粟特、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20)支胡即月氏（月支）胡。这里将卢水和支胡并列，表明在当时两者是各不相同的独立民族。由此可以认为，卢水胡自汉以来就是不同于小月氏的一支部族，由于他们居地近匈奴，其酋长很早就"世为匈奴左沮渠"之官，并以官为氏。(21)魏晋以来，卢水胡的分布十分广阔，除河西陇右外，东至杏城（今陕西中部县西南）、平城（今山西大同），南抵汶山兴乐县（今四川松潘县西北）。(22)在与上述地区各族人民的交往中，卢水胡逐渐演变为杂胡，其中有的分支更多地具备了匈奴的特点，而被人们看作匈奴，如《魏书》卷二记：天兴元年(398)"杏城卢水匈奴率种内附。"至于以沮渠氏为首的北凉统治阶层，则早已是汉化很深的卢水胡了。

姚薇元认为羯胡之石勒与昭武九姓之石国同，皆出于月氏，并且从体质（高鼻多须）和文

化(烧葬)上加以论证,似乎很有道理。从石勒的姓氏、相貌、习俗来看,可以认为他是和昭武九姓的石国同出一源的。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材料说明昭武九姓与西迁大月氏的关系,即使认为昭武九姓出于大月氏,那么他们却不像寄多罗王朝一样称作小月氏,而分别称作康、安、曹、石、米、何等九姓,表明月氏人早已被同化于当地土著居民中了。因此不能将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和月氏人划等号。至于羯胡,尽管在体质和文化上和月氏有相似之处,但我们也不能将相差几个世纪的两种人联系在一起,四世纪的羯胡只能说是杂胡,由于和匈奴共处,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被看作是“匈奴别部”。[23]此外,在石勒建国的助手中,有明为月氏的支雄、支屈六,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月氏不等于羯胡。

在上节列举的焉耆、龟兹源出或等于月氏的各种看法中,首先是焉耆、龟兹发现的所谓“吐火罗语”是否等于月氏语的问题。人们已经搞清,所谓“吐火罗语”是属于印欧语系西支,分甲乙两种方言,甲方言主要在焉耆和吐鲁番发现;乙方言主要是龟兹的官方用语,但也在上述两地发现。关于月氏的语言,早在1917年罗佛就在题为《月氏即印度斯基泰人的语言》的小册子中,根据汉文文献记载的一些月氏词汇,认为月氏语是和斯基泰语、粟特语、沃塞梯语属于同一组的北支伊朗语。[24]蒲立本反对这种看法,并找出数例,力图将月氏语比定为吐火罗语。[25]榎一雄一方面指出蒲立本用官名的对应来作为证据是不充分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罗佛把大月氏统治下的伊朗语族的语言当作了月氏语。[26]但是,贝利根据月氏未徙前所遗留下来的词汇,进一步证明月氏语即北支伊朗语。[27]迄今为止,贝利的看法无疑据有更多的语言学资料,把月氏语和所谓“吐火罗语”分别属于东西两支印欧语,这和月氏与焉耆、龟兹其他方面的不同点是一致的。其次,月氏等于吐火罗说的一条重要依据,是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二五所列国名中,兜呿罗(即吐火罗)下注云:“小月氏”。此条由烈维捡出,并将玄奘所记覩货逻故国和南山小月氏联系在一起。[28]伯希和于同年撰《吐火罗语与库车语》,反驳烈维的观点,认为罗什所讲的小月氏乃印度西北的小月氏,而非残存敦煌南境之小月氏。但和《北史》所记富楼沙小月氏的年代有抵触,故认为罗什是用当时惯用的小月氏一名来指吐火罗地区。[29]实际上,伯希和的时代,对于贵霜帝国的知识还很有限,由于钱币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现在可以确切地说,鸠摩罗什在公元406年前后所说的小月氏,指的就是第四期贵霜王朝,也即《魏书·西域传》写作“大月氏王寄多罗”的后裔,以富楼沙为都城的小月氏。[30]由于西迁的大月氏占领了吐火罗斯坦,所以周围的民族都称大月氏为吐火罗,汉人则仍用“大月氏”一名来称呼大月氏五翕侯之一贵霜翕侯建立的贵霜王国,贵霜的后裔则称为“小月氏”。鸠摩罗什曾游历罽宾、月氏、沙勒、莎车诸国,他所讲的小月氏当指吐火罗斯坦的大月氏后裔,与大月氏留在中国境内的小月氏无涉。最后还应辨明的是,贝利一直认为大月氏的“大月”可以比定为toγara(吐火罗,希腊文*θαγοῦροι*、藏文thod-kar/phod-kar、于阗文ttaugar-

a)，“氏”表示氏族，“支”表示支派。[31]此说一出，即遭到伯希和的反对。[32]因为大月氏的“大”，是大小之大，从汉语上来讲，“大月”的叫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总之，除了没有材料根据的假说外，我们很难将中国境内的月氏比定为吐火罗、将月氏语比定为吐火罗语。造成这种比定的原因是大月氏长期统治着吐火罗地区，于是人们把在印度西北月氏和吐火罗混同的概念移到了东部，造成一系列的混乱。

下面再看看焉耆龟兹人能否和月氏人等同的问题。首先，许多学者都认为，月氏西徙必定经过焉耆、龟兹，月氏的遗众也就留在了那里。其实，其他民族如乌孙等西迁时也通过这里，并非仅此月氏，所以我们基本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这两个地区都有月氏遗种的存在，下节我们将看到，同样是使用所谓“吐火罗语”的吐鲁番，就有许多月氏遗种的存在。但是，我们很难接受黄文弼先生关于焉耆龟兹就是月氏西迁时所建的国家的说法，因为焉耆王姓是龙，龟兹王姓是白，而不是月氏人所用的支，表明其王族不是出于月氏。从文化上来讲，焉耆龟兹都是靠绿洲生存的城邦定居国家，与号为“行国”的月氏有根本的区别。所以，我们只能说焉耆龟兹境内有月氏遗民的存在，而不能把焉耆龟兹和月氏等同起来。其次，说焉耆龟兹不等于月氏，有两条材料必须给以合理的解释。一是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二屈支国："古名月支，或名月氏，或曰屈茨，或名乌孙，或名乌垒……即今龟兹国也"（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卷一〇略同）。早年，伯希和捡出此条，认为“这些名称当然不是龟兹的真名”。[33]从慧琳的本文就可以看出他的自相矛盾处，既是月氏，为什么又是乌孙呢！ 的确，“龟兹”一名读音可以和“月氏”相应，[34]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仅仅名称上的对应是不足以证明其人种的相同，龟兹、尉迟、车师等名称和月氏的相似或许和月氏早年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有关，由于史料的缺乏，目前还无法讲清这些名称为什么都与月氏相合。第二条材料是宋初写本《西天路竟》将高昌、龟兹间的国家唤作月氏。冯承钧、黄盛璋据此认为焉耆即月氏。对于这条材料，王静如先生在1944年发表的《Arsi与焉耆，Tokhri与月氏》一文中，认为《高居诲行纪》所记凉州东部的“月支都督府”可以比定为焉耆出身的龙家，《路竟》的月氏则是当时汉人对ārsi（即焉耆，意为“龙”）一词的误读所致。[35]这种看法是对所谓“吐火罗语”定名的总体解说的一部分。但是，王先生将S367《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中所记龙部落首领所在的“甘、肃、伊州”误解为“Kan-su and I-chou”（甘肃和伊州），[36]于是，建立在这种误解基础上的凉州东“月支”等于龙家之说就难以成立，对《路竟》所记月氏的解说也就很难依靠了。要解释这一复杂的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考虑。《西天路竟》写于宋初，当时的焉耆、龟兹都处在高昌回鹘的统治之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七三、八〇记载真宗咸平四年（1001）、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年（1013）都有龟兹国遣使朝贡，但对于焉耆，五代到宋的史料一直保持沉默。这似乎表明由于回鹘西迁的主力首先占领其地，[37]焉耆的龙家王朝由此失去了独立的地位。正

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多少世纪以来专用的焉耆一名之外，此时又用粟特文、回鹘文的Twγry，回鹘文、于阗文的Solmi等来称呼此地。[38]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月氏一名也用来指称焉耆了。此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找出焉耆之称月氏的特殊原因。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出使西州回鹘的王延德，记其所统部族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39]此处的众熨即《高居诲行纪》所记之仲云，于阗文作Cimuḍa，是小月支之遗种。[40]西州回鹘辖下的众熨部的居地，可以从925年的于阗文《钢和泰杂卷》中找到一些线索，该文书第20—24行《地名表》中，阿耆尼(argī，焉耆)属于西州范围，和上述史实相符，值得注意的是第27—31行《部族名表》最后记载：Sāḍimīya ttrūkä bayarkāta cūṇūda，意为"在唆里迷(焉耆)，有突厥拔野古部和仲云部"，[41]表明西州回鹘所属的大小众熨部就居于焉耆附近。这样，可以设想，宋初旅经此地的汉人就用众熨的旧名月氏来称呼当时这块名称不定的绿洲了。

上面我们已经论证了焉耆龟兹的王族和主要居民都与月氏有别，那么，黄盛璋先生关于龙家和仲云一样为小月氏遗种的说法是否能够成立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龙家，敦煌出土的九、十世纪于阗语文书中作Dūṃ；[42]仲云，于阗文作Cimuḍa，敦煌汉文文书P3016作众云，可见，在当时的文献中，两者是不能混淆的。龙家本是焉耆的土著居民，九世纪中叶以后，他们开始以部落的形式出现在甘、肃、伊等州，同时代的汉、藏、于阗文献记载下了他们的行迹。龙部落突然出现在这一带，是和上面谈到的回鹘西迁，焉耆龙姓王朝失去独立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我们在此不可能把我们所掌握的龙家和仲云的材料拿来对比，只想肯定一点，就是尽管龙家分布的地域和仲云有相合的部分，但龙家决不是和仲云一样的小月氏遗种。

蒲立本关于月氏的论点之一，就是北魏尉迟氏为月氏的后裔。然而，这种说法仅仅是以尉迟和月氏音同，以及尉迟部之大非川与小月氏之湟中正在同一地区这两点为依据的。正如上面所言，龟兹、车师、尉迟之名都可以和月氏比定，所以名称的相符并不足以证明两者在民族上的等同。而且，榎一雄已经指出，"尉迟"最初出现的三世纪中叶，人们对月氏一名还是相当熟悉的。[43]除了榎氏列举的材料外，还可以补上前面所引的《邓太尉祠碑》和传世的"晋支胡率善仟长"印、"晋支胡率善佰长"印。[44]如果尉迟是月氏，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人们不用月氏或支胡来称呼他们。尉迟一名，后来是以于阗王姓著称于世的，虽然于阗王姓之称尉迟到唐代才稳定下来，[45]但尉迟为于阗文Viśa'的音译则是肯定的。[46]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二记于阗建国以后，"奕世相承，传国君临，不失其绪。"藏文《于阗国授记》(Li-yul lung-bstan-pa)更详细记载了鸿扬佛法的每一代于阗王的姓名，表明尉迟一姓从大约公元前二世纪于阗建国后不久，就统治着这里。[47]蒲立本回避了于阗王姓和大非川尉迟部的关系问题，我们同意周一良先生最近提出的看法，认为大非川的尉迟部来源于于阗王族。[48]从语言上

来讲，于阗语属于塞种语，[49]所以，作为"魏之别种"的"西方尉迟氏"，既不是蒲立本所说的月氏，也不是榎一雄所讲的鲜卑，他们或许就是来源于于阗的塞种人。此外，周伟洲根据当时民族的分布情况，怀疑尉迟渴权所居之大非川并不是唐代的大非川，而应位于陇西或朔方一带。[50]对于蒲立本从地理分布上将尉迟勘同为月氏的说法，这也是新的质疑。

以小月氏为研究主题的榎一雄氏在霍古达之后，对两汉到五胡十六国时期月氏的活动作了较为彻底的考查，由于材料的限制，榎氏除了提到敦煌的月氏集团外，特别强调了活跃在渭水盆地东部至山西西部的一支月氏遗裔，似乎还没有把月氏的动向彻底搞清。

南北朝以前的西北少数民族不像隋唐以后的突厥、回鹘、吐蕃等族那样，留下了自己的文字材料，所以，只有当他们与汉人接触时才被记载下来。因此，那些断断续续出现在史籍中的记载只是凤毛麟角，并不能使人看到他们的全貌。于是产生了许多假说，用来填补史料间的空白，其中有些是合理的，有些则是站不住脚的。近年来，一些地方文书和碑志的公布，使我们能够进一步考查月氏的动向问题了。

三

通过上节的详细分析，我们把前人提出的卢水胡、羯胡、尉迟部以及焉耆、龟兹的居民都排除在月氏余种之外。下面就以明确记载为月氏后裔的材料为据，来探讨这个民族的去向和消亡问题。

大致可以说，蒲立本（尽管比定不确）和榎一雄都是从民族迁徙的角度去探讨小月氏的踪迹，或曰迁到云中，或曰活跃在渭水盆地东部至山西西部地区。这就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民族发展的主流是民族融合。小月氏所处的河陇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又是东西南北文化交往、民族移徙往来的孔道。汉武帝以后，月氏西徙，匈奴败走，汉朝于河西列四郡，移民实边。王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51]其时，又有大批汉人逃到那里。黄巾起义以后，中原扰乱不止，有董卓之乱、八王之乱、刘石纷乱，中原悉为战场，大批士人和民众除南渡外，多迁往西北，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的发展。小月氏族正是在这股洪流中逐渐消失的。然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而且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深浅不同的程度。

大月氏西迁以后，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从月氏未徙前的分布来看，这里的南山似乎不应像榎一雄所说的仅指祁连山东段，而应指原月氏人所居之地南部的山，不仅包括祁连山东西各处，甚至还应指昆仑山（即南山）。关于河西走廊南山的小月氏，《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记："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

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关于昆仑山北麓的小月氏，《三国志》卷三〇《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称："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传闻黄牛羌各有种类，孕身六月生，南与白马羌邻。"由此不仅可以看出小月氏分布在横亘数千里的广袤山阻地带，更主要的是告诉我们，小月氏已和羌族互通婚姻，共同生活，交相融化。《后汉书·西羌传》又说："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与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可见，小月氏虽然还保持着自己的部落组织，但在语言和文化上已渐渐为羌人所同化。因此，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时而就把小月氏和羌看作一个种族了，如《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载，小月氏种的狼何被称为羌侯；上引《魏略·西戎传》也称月氏余种为葱茈羌、白马羌和黄牛羌；《后汉书》卷五三《窦融传》载："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与大军会高平第一。"这些都说明小月氏和羌逐渐融合，难以区分了。祁连山区和湟水流域的小月氏，除了与羌人融合外，随着汉族势力在这里的增强，同时也走上了汉化的道路。汉武帝时，"票骑将军涉钧耆（今石羊河的一段），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52]以后的情形，《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表明月氏接受汉化，开始由游牧转为农耕。

然而，小月氏的分布不仅仅局限于此，《水经注》卷二引阚骃《十三州志》曰："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这是其主要分布区。《三国志》卷三三《蜀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建兴五年（227）刘禅诏，言诸葛亮准备北伐，"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犄角其后。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这里提到的月氏胡侯支富应是小月氏在凉州一带的部落酋长之一。[53]此外，《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安定郡下有"月氏道"，则安定（今甘肃泾水县）一带有月氏。据上引《后汉书·窦融传》，知高平（今甘肃固原县）一带有月氏。前秦《邓太尉祠碑》记冯翊（今陕西大荔）有支胡。可见，月氏的西端可到葱岭，东端则进入关中渭水流域。

两晋以后，这种以整体部落为名的月氏民族已渐渐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水经注》卷二记："湟水东流，迳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表明郦道元时，此地已没有小月氏国了。在这片广大土地上的小月氏，或则为其他少数民族同化，或则为汉族所吸收。只是因为材料的局限性，我们只能从汉文文献有关支姓人的记载，[54]来考查月氏后裔的行踪。即使是丰富的汉文材料，也只能把我们的视野限制在关中及其邻近地区、敦煌、吐鲁番和罗布泊四个地区，但是，这四个地区大体上可以反映月氏后裔的基本情况。

（一）关中及其邻近地区：

关中及其邻近的河南西部、山西西南部，是华夏族的发祥地，秦汉以来作为都城所在地，是汉文化最昌盛的地区。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这一地区成为各民族融聚的中心之一。小月氏也同样来到这里，除了上引《邓太尉祠碑》表明冯翊有支胡外，下述史料可以透露出一些月氏后裔在这里的行迹。

《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记其最初起事时的情况时说："（石勒）遂招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为群盗，后敦敖、刘徵、刘宝、张噎、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又赴之，号为十八骑。"关于支雄，《元和姓纂》(孙星衍辑本)卷二支条引《石赵司空支雄传》云："其先，月支人也。"[55]证明这里的支雄和支屈六都应是月氏的后裔，他们在永嘉前后活跃在山西西部地区。

《晋书》卷五《怀帝纪》载：永嘉三年(309)七月辛未，"平阳人刘芒荡自称汉后，诳诱羌戎，僭帝号于马兰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众数千为乱，屯新丰，与芒荡合党。"可见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有月氏胡。隋末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或许就出自这支月氏部众。《隋书》卷八五《王充传》记："王充字行满，本西域人也。祖支颓耨，徙居新丰。颓耨死，其妻少寡，与仪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琼，粲遂纳之以为小妻。其父收幼孤，随母嫁粲，粲爱而养之，因姓王氏，官至怀、汝二州长史。充卷发豺声，沉猜多诡诈，颇窥书传，尤好兵法，晓龟策推步盈虚，然未尝为人言也。开皇中，为左翊卫，后以军功拜仪同，授兵部员外。善敷奏，明习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驳难之者，充利口饰非，辞义锋起，众虽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称为明辩。"[56]除了体质上仍保留了一些月氏人的痕迹外，王世充已经完全汉化。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载："北地(今陕西耀县)人支酉聚众数千人于长安城北西山起义。"除此之外，长安附近的月氏后裔还可以从两块石碑题名中找到。一是长安东郊西魏大统十年(544)《邑子二十七人造像记》，曰"支曜"。[57]又一是近年在渭南县渭河北岸发现的北周武成二年(560)《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曰"支舍妃"。[58]

这批活跃在关中及其邻近地区的月氏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其中一定有从湟中或安定等地迁来的，但有趣的是，其中部分人很可能和汉武帝时降汉的两个小月氏王有着渊源的关系。《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成功臣表》载："骒兹侯稽谷姑，以小月氏右(《史记》作若)苴王将众降，侯，千九百户。(元封)四年十一月丁未封，三年，太初元年薨，亡后。琅邪。瓡讘侯杆(《史记》作扜)者，以小月氏王将军众千骑降，侯，七百六十户。正月乙酉封，二年薨。六月，侯胜嗣，五年，天汉二年薨，制所幸封，不得嗣。河东。"[59]河东(今山西省夏县东北)一支月氏后裔的情况，史籍缺载。琅邪(今山东诸城)一支的情况约略可考。《元和姓纂》卷二支条引刘宋何承天著《姓苑》云："今琅邪有支氏。"除了留在琅邪的支氏外，琅邪的月氏后裔又西迁入关中，支雄就是其中的代表。《石赵司空支雄传》今佚，只有"其先，月支人也"数字保存下来。

支雄出自琅邪，有一组其后人的墓志铭为证。这批墓志铭包括《唐故江州寻阳县丞支公(光)墓志铭并序》、《唐故赠随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及殿中监支公(成)墓志铭并序》、[60]《唐故鄂州司士参军支君(叔向)墓志铭并序》、[61]《唐鸿胪卿致仕赠工部尚书琅邪支公长女炼师墓志铭并序》、[62]《唐故鸿胪卿致仕支公孙女墓志铭》[63]等共六方，同属于一个家族，共计五代。其中《支光墓志铭》记述较详："其先琅邪人，后赵司空始安郡公曰雄七世孙也。永嘉之乱，衣冠违难，鳞萃江表，时则支氏浮江南迁。其后派别脉分，因居吴郡属邑，曰嘉禾里。"另外，《支叔向墓志铭》对于永嘉以前的情况有所补充："其先琅邪人。居云阳，晋末崩离，遁累叶于江表。"由此可知，支雄一系出身琅邪，后西迁入关，曾在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暂住。西晋末年，其中一支避乱南渡，而支雄等人则活跃在今陕西、河南、山西的广阔天地中。上述墓志，多撰于唐大中十年，同出于洛阳邙山，从墓志中得知，这支南迁的支姓，一直以支雄为其始祖，盼望回到中原故土。唐大中年间，支成子讷尊照父亲的遗愿，自吴郡护父祖之灵輀，归葬于"河南县平乐邙山原"，以陪祖祢，表明支雄一支最后落在洛阳。《千唐志斋藏志》中的《大唐故文林郎支君墓志铭并序》的志主支敬伦，[64]应是留在此地的支姓人之例。然而，支雄的足迹曾遍布陕西渭水流域和山西西部地区，琅邪支氏也曾暂住于云阳，因此，这支大姓在关内留存下来是可以理解的。唐开元年间制成的《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记关内道七十九个大姓中，就有两个支姓，分别居于雍州京兆郡和同州郃阳郡。[65]他们中间或许就有汉代以来出身琅邪的大姓。唐代长安城内支姓人的存在，还可以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份来自长安的《质库帐历》中看到，名"支才"。[66]这些早就入居中原的月氏人，经过近千年的汉文化的陶冶，已经完全汉化。元人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二记宋画家，有"支仲元，凤翔人，画人物极工，笔法师顾、陆，紧细有力，人物清润不俗。"这位月氏后裔甚至在国画上有很高的造诣，从文化上来讲，他们早已是汉族，而不是月氏种了。

(二) 敦煌地区：

敦煌地区曾经是游牧的月氏族的根据地之一，大月氏西迁后，大部分小月氏南入山阻，与诸羌杂处，但同时也有一批月氏人进入汉人居住地，成为城乡居民。《高僧传初集》卷一记："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故姓竺……护世居敦煌，死而化道周洽，时人咸谓敦煌菩萨。"一般来讲，由贵霜帝国而来的大月氏僧人都以支为姓，法护改支姓为竺姓，可见其不是来自大月氏，应是世居敦煌的小月氏无疑，他活动的年代在西晋武帝、惠帝时，其后的情形如何，由于南北朝时期史料缺乏，不得而知。唐五代的敦煌文书又重新告诉我们这里的月氏后裔的情况。现将前人和我们检索所得材料录下：

P2803背《唐天宝九载(750)敦煌郡仓纳和籴谷牒》第4件第23行："支忠

臣粟二硕。”(67)

D_x—2355A《破除历(?)》记有“支贤德、支惠眠、支义深、支惠□”之名。

D_x—1405《九世纪末——十世纪初沙州布头索留信等造布历》有“支张三”名。

D_x—1048A《九世纪后半——十世纪沙州敦煌县効谷乡百姓康满奴等户别地籍集计文书》第3行:“户支海晟多农地二十亩。”

P2837《吐蕃辰年(836?)正月二月沙州男女施入疏》,其中第1件即“弟子支刚刚疏。”(68)

P2049背《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计会》第123行:“麦一斗,支庆利润入。”(69)

从以上文书可以看出,在月氏原来的故乡敦煌,月氏的后裔和当地的汉族人民一样,受田纳税,成为唐朝或其他政权的编户黎民。

(三) 吐鲁番地区:

我们也是在幸而残存下来的古文书中找到有关月氏后裔的记载的,现依年代顺序列举如下:

《高昌某年财物疏》第10行:“支主簿綖一百五十三丈五尺。”(70)

《高昌某年田地、高宁等地酢酒名簿》第二件第3行:“支寺孝安十二升。”(71)

《高昌某年洿林道人保训等入酒帐》第三件第10行:“支苏但七斗(下残)。”(72)

《高昌延昌四十年(600)供诸门及碑堂等处粮食帐》第一件第5行:“次六斗,付支法供巷中。”(73)

《唐初白夜默等杂器物帐》第7行:“支熹伯木椀+□□八”。此名又见同墓所出《唐初邵相欢等杂器物帐》第2行:“支熹伯案枷一。”(74)

《唐广德三年(765)伍保文书》第4行:“保内支奉仙准前粟两硕,付男皎盛领。”(75)

D_x—1393《唐某年(八世纪)西州郭令琮等种田簿》第一件第4—5行:“支方下菉豆二亩,又油麻七亩,又床一亩半。”(76)

这些文书上所记载的月氏后裔,可能就是月氏西迁路过时留下来的,他们和留在敦煌城区的月氏遗民一样,早已被同化到汉人之中,如果没有这个支姓的话,恐怕当时的人们也很难知道他们的族源了。

(四) 罗布泊地区:

这一带在先秦两汉时期大概就有月氏部族活动,但最早的证明是前引《魏略·西戎传》所记:“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楼兰一带出土的简牍也留下了一些记载,斯坦因编LA. II. ii号遗址出土木简有:“结稟将尹宜部兵胡支鸾十

二人。”又有：“支得失皮铠一领，皮兜鍪一枚，角弓一张，箭卅枚，木桐一枚。高昌物故。”又LA. Ⅵ. ii.04号木简记：“兵支胡薄成，兵支胡重寅得，右二人共字驴四岁。”LB. Ⅳ. i.2号木简有：“兵支胡管支”之名。[77]布劳夫在《关于三世纪的鄯善及其佛教史的几点评注》中认为，这些月氏兵士应出自小月氏，此时成为鄯善王国的居民。[78]这种讲法是可取的。

由于战争和自然的原因，昔日繁盛的楼兰鄯善王国早已消失在荒漠之中，但罗布泊一带仍是一个少数民族活动的中心，从北朝到唐末五代，吐谷浑、粟特、吐蕃、萨毗等部族都曾占据此地。五代中叶，一支称作“仲云”的小月氏遗种又占据这里，[79]《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引高居诲《使于阗记》记载了他们的一般情况：“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庐碛。云仲云者，小月氏之遗种也。其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皆惮之。……地无水而尝（常）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匡邺等以诏书慰谕之，皆东向拜。”仲云即《王延德行纪》中的众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拂菻国条的种榅和于阗语文书中的Cimuda，这是仍然保持着部落形式和骠悍性格的唯一一支小月氏遗种，他们的出现是和九世纪中叶西北各民族之间力量的消长以及迁徙变动有关，也是月氏民族最终消亡前的回光反照，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十一世纪以后，仲云不见记载，仲云的消失，宣告了小月氏在中国历史上的消亡。[80]

通过对小月氏及其后裔的历史的综合考查，可以看出，小月氏族和中国中古史上许多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尽管昔日十分强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过程中，一部分为其他少数民族所吸收，大部分则同化为汉人，从纵横驰骋的骠悍游牧部落转为定居城郭的农耕居民。虽然其中某个支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重新以游牧的方式出现，但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个小小的浪花，很快就消失了。月氏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在北宋时期最终消失在民族融合的洪流之中，他们的后裔作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一员，共同缔造着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1) 本文所讨论的小月氏，是指大月氏西迁后留在今中国境内的余众，与贵霜王朝末年的小月氏寄多罗王朝无涉。

(2)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155页；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403—414页；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第八羯族诸姓沮渠氏条，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65—369页。

(3) 《北朝胡姓考·外篇》第八羯族诸姓石氏条，第355—358页。

(4) Gustav Haloun, “Zur Üe-tsi-Frage”，《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第91卷，1937年，第243—318页。

(5) 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报》(BSOS)第9卷，1938年，第545—564页。

(6)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第158—159页。

(7) 黄文弼《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又《大月氏故地及西徙》,载《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5—67、115页。
(8)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英国王家亚洲协会会刊》(JRAS),1966年,第9—39页。
(9) 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社会与历史·魏特夫纪念论文集》(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海牙,1978年,第215—230页
(10)黄盛璋《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第15—16页;又《〈西天路竟〉笺证》,《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第5页;又《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西域史论丛》第二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254—268页。
(11)H. W. Bailey, 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 Ⅶ,剑桥,1985年,第110—142页。
(12)蒲立本上引文,第18—19页。
(13)榎一雄《小月氏と尉迟氏》,《古代东アジア史论集》下卷,东京,1978年,第391—418页;斯英琦、徐文堪译,载《民族译丛》1980年第3期,第48—54页;第4期,第55—60页。
(14)王国维《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观堂别集》卷一,载中华书局本《观堂集林》第四册,第1156—1157页。
(15)按《管子·轻重篇》屡次提到"禺氏之玉"、"禺氏边山之玉"或"玉起于禺氏"。马非百在《论管子轻重上——关于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中,认为此书成于西汉时期特别是王莽时代。见其所著《管子轻重篇新诠》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3—50页。榎一雄《禺氏边山の玉》一文,在马氏《新诠》的基础上,认为《管子轻重篇》的编者,借用了先秦文献中禺氏一名,来指称汉武帝以后方为汉人所知的玉之产地于寘(于阗),见《东洋学报》第66卷,1985年,第109—132页。今姑从其说,不以《管子轻重篇》为据。
(16)《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引阚骃《十三州志》:"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水经注》卷四〇引杜林曰:"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
(17)榎一雄《小月氏と尉迟氏》第411页。
(18)王宗维《汉代卢水胡的族名与居地问题》,《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第25—34页。
(19)同上,第27—29页。
(20)此据马长寿校录本,载《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标点略有修订。
(21)《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22)参看《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三国志·魏志·张既传》注引《魏略》,又《梁习传》注引《魏略》,《晋书》卷六十《贾正传》,《资治通鉴》卷一〇六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三月条,《魏书》卷二《太武纪》以及《华阳国志·大同志》等。
(23)《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魏书》卷九五《羯胡石勒传》。
(24)B. Laufer, The Language of the Yüe-chi or Indo-Scythians,芝加哥,1917年;收入《罗佛论文集》第二卷,威斯巴登,1979年,第1107—1118页。按罗佛是其自取名,今从之,旧译一作劳费尔。
(25)蒲立本上引文,第9—39页。
(26)榎一雄上引文,第416—417页。
(27)贝利上引书,第129—137页。
(28)烈维《吐火罗语》(S. Lêvi, Tokharien),《亚洲学报》(JA)第222卷,1934年;冯承钧译载《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第59—60页。
(29)P. Pelliot, "Tokharien et Koutchéen",《亚洲学报》第224卷,1934年;冯承钧译载《吐火罗语考》,第78—86页。
(30)《北史》卷九七《西域传》小月氏国条。参看萨莫林《关于寄多罗和寄多罗人》(W. Samolin, A Note on Kidara and the Kidarites),《中亚杂志》(CAJ)第2卷,1956年,第295—297页。
(31)贝利《吐火罗考》(Ttaugara),《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报》第8卷,1937年,第883—887页;又《雅利安语札记》(Ariaca),《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报》(BSOAS)第15卷,1953年,第533—536页;以及贝利上引书,第110—116页。
(32)伯希和《说"吐火罗语"》(A propos du "Tokharien"),《通报》(TP)第32卷,1936年;冯承钧译载《吐火罗语考》,第138—141页。
(33)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吐火罗语考》,第123页。
(34)恒宁《历史上的第一支印欧种人》,第225—226页。
(35)Wang Ching-ju, "Arsi and Yen-ch'i, Tokhri and Yüeh-shih",《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第9卷,1944年,第87—89页。
(36)同上,第88页。

(37)森安孝夫《ウイグノレの西迁につへて》,《东洋学报》第59卷,1977年,第105—130页。

(38)参看恒宁《焉耆和"吐火罗人"》,第545—564页;耿世民与张广达师合写《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47—159页。

(39)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四。

(40)哈密屯《十世纪仲云部考》(J. Hamilton, Le pays des Tchong-yun, Čungul, ou Cumuḍa au Xe siècle),《亚洲学报》第265卷,1977年,第351—379页。

(41)贝利《于阗语文书集》第二集,第74页;参看恒宁上引文,第558页。

(42)贝利《于阗语文书集》第七集,第16—17页。

(43)榎一雄上引文,第413—414页。

(44)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1985年,第71叶正面。《上海博物馆藏印选》,第80页。

(45)于阗王姓,北魏有"于"(《大魏文成皇帝夫人墓志铭》,赵万里辑《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三册,图版三八),隋有"卑示"(《隋书·西域传》),唐有"伏阇"、"伏师"(《旧唐书·西域传》)等异译。

(46)贝利《于阗语文书集》第四集,剑桥,1961年,第7页。

(47)托玛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F. W. Thoman,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第1卷,伦敦,1935年,第89—136页;恩默瑞克《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R. E. Emmerick,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

(48)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401—402页。按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四四方诸姓尉氏条,据445年吐谷浑主慕利延入侵于阗一事,认为于阗王朝出于大非川的尉迟部,似难成立。

(49)贝利《塞语》(Language of the Saka),《东方学家手册》(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第一辑,第4卷,第1分册,莱顿,第131—137页。

(50)周伟洲《乞伏鲜卑与陇西鲜卑》,《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1期,第7—8页。

(51)《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

(52)《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

(53)这里的康居胡应指在凉州建殖民聚落的粟特商人。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认为此处的月氏、康居胡侯是指东汉末年由贵霜帝国迁来,侨居葱岭以东而受封为侯者,见《经济理论与经济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32—135页;又参看同作者《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4—45页。这种说法是为了支持作者关于鄯善佉卢文来源的假设而提出的,但却忽略了全部两汉以来关于小月氏的种种记载,似有未妥,今不取。

(54)除了汉末以来由贵霜帝国东来汉地传播佛教的高僧如支娄迦谶、支谦、支昙籥、支昙迁等和一些商人,大部分以支为姓的僧俗民众,应出自小月氏。因为没有史料证明曾有大批大月氏人再次东迁并分布广泛。

(55)参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三;《资治通鉴》卷八七《晋纪》九永嘉三年正月注引《姓谱》;《通志》卷二六。

(56)《旧唐书》卷五四,《新唐书》卷八五本传略同。

(57)《金石续编》卷二;参看马长寿上引书,第50页。

(58)马长寿上引书,第58页。

(59)《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略同。参看《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

(60)《千唐志斋藏志》下册,文物出版社,1984年,图版一一三二、一一三三。

(61)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续编》,《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第十二册,第4345—4348页。

(62)《千唐志斋藏志》下册,图版一一五八。

(63)《罗雪堂先生全集》七编第十二册,第4348—4349页。

(64)《千唐志斋藏志》上册,图版二二二。

(65)敦煌卷子S2052,录文载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研究·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东京,1962年,第640—646页。该谱记徐州彭城郡也有一支姓,或许也出自琅邪。

(66)《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315页。参看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的〈质库帐〉看唐代的质库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16—343页。

(67)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1979年,第474页。

(68)以上四条是土肥义和捡出的,见榎一雄上引文第417—418页的附注。其中D_x—1405和D_x—1408 A的录文,载山本达郎《敦煌发现オデンブルブ将来田制关系文书五种》,《石田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5年,第529,531—532页;P2837录文,载池田温上引书,第547页。

(69)池田温上引书,第621页。
(70)《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94页。
(71)同上书第四册补遗,第10页。
(72)同上,第20页。
(73)同上书第二册,第363页。
(74)同上书第六册,第49页,55页。
(75)仁井田升《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东京,1937年,第319页。
(76)池田温上引书,第492页。
(77)以上录文见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3页(No.239),56页(No.293),67页(No.434),79页(No.604)。按斯坦因在尼雅遗址挖到两枚木简,文曰:"月支国胡(下残)"和"月支国胡支柱,年卌九,中人,黑色"(同上书,第87页,No.699;86页,No.673)。因是过所,不能证明持有者来于何处,故不取。
(78)John Brough, "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报》第28卷,1965年,第605—606页。
(79)关于仲云的住地,曾有争论,今从榎一雄《仲云族の牙帐の所在地について》,《铃木俊教授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4年,第89—102页。
(80)由于仲云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拟另文专论,此处从略。

一九八二年六月初稿
一九八六年三月修订